

中国各阶层人口的数量及阶层结构^{*}

——利用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做的估计

张 翼 侯慧丽

【摘 要】 文章利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国际职业声望量表和每一职业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所占的百分比,估计了中国就业人口的阶层结构状况。结果发现,位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占各个阶层总人数的 64%左右;“蓝领”工人占 23.9%;“白领”阶层占 12.2%，“白领”阶层中最上层的专业人员阶层和管理者阶层,仅占整个社会劳动者总数的 1.1%。由此认为,中国阶层结构是一个底盘还很庞大的“烛台”,这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阶层结构还有一定距离。

【关键词】 阶层 职业分层 阶层结构

【作 者】 张 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侯慧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引 言

在一个社会的人口不发生重大突变的情况下,人口阶层结构的变化,带动着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如果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人口的阶层变化还比较缓慢的话,那么,90 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社会分工的细密化、新型职业的大量出现、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以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人们的阶层属性就开始在变动中显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与阶层结构相关的重要问题,就成为政府与学术界不得不关心的热门话题。

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哪些阶层处于社会的顶层?哪些阶层处于社会的底层?各个位于不同社会等级的阶层各自拥有多大的人口规模?尤其是,顶层阶层有多大的人口规模?底层阶层有多大的人口规模?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既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基本认识,也影响着研究者自不同立场出发所暗含的不同政策诉求。不同的学术派别,对一个既定人口内部的阶层状况的看法不同,其划分的阶层等级和种类也就不同。有时,即使是在同一个学术派别内部,因为学者们进行阶层分析的出发点不同,他们对共同面对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剖析也就不同。所以,在利用数据进行阶层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申明我们的学术取向。

在我们看来,虽然众多有关阶层分析的文章表现着各自的主张,但在学术渊源上,仍然可以将其分类为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和综合主义(即将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结合在一起的阶级分析主义)三个派别。如果抛开纯粹的理论辨析不谈,只在经验研究领域考察研究者的学术出发点,那么,在当前的西方理论界,瑞特(Wright)和冈索普(Goldthorpe)分别执掌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的门户。瑞特(1979)从阶层之间的关系来分析美国的阶层结构,冈索普(1987)则从职业结构这个代表现代社会基本特色的立场审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该说,瑞特和冈索普的方法弥补和填充了现代社会

* 此文为蔡昉主持的“中国人口战略研究”课题的一个子课题——“中国人口的社会结构”的部分研究成果。

学界认识阶层结构的逻辑空白,本无高下之别。但冈索普用以分析的方法更具有普适性,因为利用职业来分层的数据更易采集。

考虑到这一点,也考虑到我们使用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①中,有详细的在业人口的职业状况(但却缺少受雇和雇主等这样的信息,这使我们无法从财产的所有制性质出发去分析社会阶层),所以,我们将主要以职业为依据,以具有韦伯主义取向的理论架构去分析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口的数量及其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二、职业的等级化

因为阶层具有等级性,所以,以职业取向分层的前提,就是将职业等级化。较早对职业的等级进行经典分析的社会学家,当首推美国的爱德华兹。他将原来只具有定性变量性质的职业看做具有等级性质的职业,进而构建了职业量表,即爱德华兹量表(Edwards' scale)。这是他在1938年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普查资料创立的。他第一次根据每一种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将职业划分为六大类(10个等级)^②:(1)专业人员;(2)有产者、经理和职员(包括农民、批发商和零售商等);(3)店员及类似店员的人员;(4)技术工人;(5)半技术工人;(6)体力工人(包括农场工人、工业和商业工人、仆役人员等)(Blau和Duncan,1967)。

在爱德华兹之后,美国的诺斯和哈特以国民意识研究中心为基地,在1947年对美国的职业声望进行了系统排序,并公布了其所调查的90种职业的声望高低次序。不满足于诺斯和哈特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邓肯随后又系统构建了为韦伯主义多元分层理论家所需要的几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作为因变量的某种具体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该职业的社会声望,即在声望调查中获得“非常好”和“好”的评价的比率 X_1)与收入(该职业从业人员在1949年获得3500美元及以上者所占比重 X_2)和文化程度(该职业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获得者所占比重 X_3)之间的线性回归方程(Blau和Duncan,1967:121~125)。该方程为:

$$X_1 = 0.59X_2 + 0.55X_3 - 6.0 \quad (R^2 = 0.83)^{\text{③}}$$

其后,布劳和邓肯两人合作撰写了《美国的职业结构》一书。他们以自己采集的数据再加之1950年美国人口普查,推算了美国人口普查局所有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他们依据这个指数对美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结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这种以职业考察社会等级和结构特点的方法,很快就推广到其他非西方国家。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家看来,工业化刺激之下传统职业的分化趋势和现代职业的等级制特点,不应该只是西方社会的独有特征,而应该是工业主义为全球带来的时代共性。1977年,美国社会学家垂曼(Treiman)出版了“标准国际职业声望量表”。该量表以1969年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标准国际职业分类表(ISCO)”为基础扩充为509种职业。垂曼在对60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声望量表进行比较后发现,各国和各地区对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极其相似(相关系数为0.80),并据此认为人们对职业声望的评价超越了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不因为国情和宗教文化的差异而变化(许嘉猷,1992)。

受美国 and 西方其他国家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中国的社会学家,在改革开放以来,曾对职业声望进行过诸多研究。虽然对某种职业的评价,存在与国际职业声望量表的差异,但大体上来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后,中国职业的分化越来越细密,与国际其他市

①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中的抽样数据。

② 197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又将爱德华兹量表加以扩大,将400多种不同的职业类别划分为专业技术人员、经理及行政人员、销售人员、店员、技艺人员、操作员、交通设备操作员、工人、有土地的农民及农场经理、农场工人、服务人员、私人家庭受雇人员十二大类。

③ 许欣欣(2000)在研究中国职业声望和社会流动中得到的公式为: $EII = 5.622 + 15.816(\text{教育}) + 0.763(\text{收入})$ 。

场经济国家的可比性也逐渐增强了。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人们对那些知识含量高、权力支配能力强、收入水平较高的职业的评价也较高(戴建中,1994;陈婴婴,1995)。这与国际职业声望量表的职业排序基本一致。

三、中国人口的职业分层

中国学者对职业声望的调查和研究虽已经进行了多次,但其职业声望调查涉及的职业数量较少,大约与诺斯和哈特调查的数量相当,在100种左右。某些非学术性的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更是将能够想见的职业归类为7~8个类别以访问民众的推崇程度。职业声望调查中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这些调查大多被局限在少数省份,有些调查仅涉及2~3个省份的抽样个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使用这些数据去分析人口普查的资料。另外,邓肯的社会经济指数需要收入的指标,但中国历次人口普查都缺少对普查对象收入的调查,而垂曼的国际职业声望量表则包括了更多的职业种类,因此,我们选择该量表来分析中国的职业分层状况。

(一) 分层指数的确定

“五普”将普查对象的职业分为大类(8个)、中类(65个)和小类(410个)。在长表抽样数据中,我们能够得到的小类职业总共有404种。由于某些小类职业的个案数很少,往往只抽中了1~2名个案。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将这些出现频次很低的职业类别合并到与其相近的类别中,使这些类别的最小频次不低于30。然后依据垂曼的国际职业声望量表,对每一种职业的声望进行赋值。为了回避单纯依靠职业声望分层所存在的偏差,我们在这里引入了另外一个在人口普查中获得的非常可靠的变量——被访问者的文化程度,并分别计算了每一职业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获得者所占的百分比”。具体做法是:在由“职业声望”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获得者占该职业的百分比”所构成的二维坐标中,这两个变量之积,即由这两个变量之积所占有的面积的大小,决定该职业在层级里的具体地位。面积大小不同,就意味着职业之间的分层等级存在差距。如图所示,越是处于右上角的位置,阶层地位就越高;相反,越是处于左下角的位置,阶层地位就越低。

虽然中国的人口普查缺少收入这个重要的变量,但有了“职业声望”和“文化程度”这两个变量的补充,就可以判断从业于某个具体职业的人们的社会地位。从以往的各种研究可以知道,人们的收入深受其文化程度的影响。人们在判定职业声望高低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了该种职业收入的多少。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职业声望”与该职业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获得者所占的百分比”之积作为分层指数。表1给出某些具有日常代表意义的职业的分层指数。从表1可以看出,越是权力资本、文化资本占有量较大的职业,其被赋予的职业分层的指数就越高;而越是那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其被赋予的职业分层指数就越低。

(二) 中国人口的职业分层

根据职业分层指数的高低,我们将“五普”数据中就业人员的职业阶层依次划分为“上上层”、“上下层”、“中上层”、“中下层”、“下上层”和“下下层”6个阶层。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中下层”及以下的阶层,主要是“白领”阶层。在“下上层”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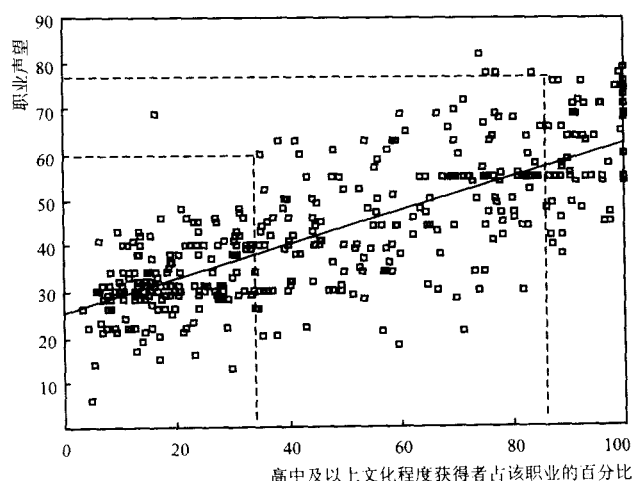


图 归类职业的散点图和回归线

注: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后获得。

表 1 部分中国人口职业分层指数

职业	职业 声望	高中及以上 文化程度获 得者所占 百分比	“五普”长表 抽样数据中 该职业出现 频数	职业分层 指数
高等学校教授	78	99.2	725	7737.6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机构负责人	76	92.5	1063	7030.0
科研单位负责人	64	94.6	37	6054.4
教学单位负责人	64	92.8	529	5939.2
卫生单位负责人	64	91.5	117	5856.0
国家权力机关及其 工作机构负责人	64	89.9	207	5753.6
工程技术人员	66	85.1	490	5616.6
建筑工程技术人员	70	69.6	969	4872.0
石油工程技术人员	55	87.9	66	4834.5
中学教师	47	97.4	4492	4577.8
特殊教育教师	45	96.4	28	4338.0
小学教师	42	88.8	6075	3729.6
保险业务人员	44	81.9	337	3603.6
人民警察	40	87.2	1373	3488.0
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	63	38.4	804	2419.2
石油、天然气开采人员	31	64.9	208	2011.9
运输车辆装配人员	44	35.3	363	1553.2
社会中介服务人员	31	49.6	121	1537.6
推销、展销人员	28	53.5	3921	1498.0
物业管理人员	29	51.5	297	1493.5
机械设备维修人员	43	30.7	4475	1320.1
重有色金属冶炼人员	38	30.7	114	1166.6
饭店服务人员	34	34.1	1758	1159.4
机械热加工人员	38	24.0	2753	912.0
纺纱人员	34	18.4	1449	625.6
钢筋加工人员	28	17.5	382	490.0
园艺作物生产人员	21	6.8	16142	142.8
大田作物生产人员	22	4.4	394297	96.8

资料来源: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抽样数据。

下层”的都是“蓝领”劳动者。在“蓝领”劳动者中,传统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等处于“下上层”,而农民则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中国社会未来流动的主要趋势是从农民阶层不断向“蓝领”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阶层转化。

本研究分析得到的农业人口,实际上包括了少数农副产品和水产品加工人员。因为这些职业内部从业人员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很低,且职业声望不高。从“五普”长表抽样数据可以计算出,纯粹的种植业即大田作物种植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 5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是“未就业人口”城乡差异的影响。从表 3 可以看出,15~64 岁人口的“不在业率”,城市为 34.41%,城镇为 27.72%,而农村仅为 11.06%。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职业分层的阶层结构,使得处于城市的那些阶层在整个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会相对小一些。

尽管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阶层结构,仍然具有极其传统的人口社会结构性质,与其说是底盘极其庞

大的“金字塔”结构,还不如说是“烛台”结构更为形象。因为职业分层的底部人口占很大的比重,所以,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就是人口的职业转换和城市化。而将“下下层”(主要是农民)转化为其他阶层的前提,是通过教育以提高农民子女的人力资本,实现产业结构的逐步转移。

(三)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职业大类分层

在已经发表的某些著述中,有人直接依据普查时登记的职业大类,对中国人口的职业阶层进行了归类和计算,但我们不敢苟同这种计算方法。因为在同一个大类中的从业人员,一方面文化程度差异很大,另一方面其具体职业的声望也高低不等。比如,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这个大类之中,“民主党派负责人”(中类)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获得者的百分比”仅为 48.9%,而“国

表2 中国在业人口的职业分层

分层	分层指数 区间	频次 (人)	占从业 人员的 百分比	估计该阶 层总人数 (万人)	职业类别说明
上上层	7900~5600	7423	1.1	773	科研单位负责人、高校教师、政府行政机构负责人、科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主治医师、企业家等
上下层	5599~4600	12987	2.0	1353	各种工程技术人员、记者、会计、翻译、人民团体负责人、证券业务人员等
中上层	4599~3800	24043	3.6	2504	中专和中学教师、行政单位办事人员、银行业务人员、农林技术人员、普通企业管理人员等
中下层	3799~1500	36879	5.5	3841	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矿山技术人员、兽医、电信业务员、粮油管理员、检验人员等
下上层	1499~200	160012	23.9	16667	各种制造业工人、电影放映员、仓储储运人员、治安保卫人员、农林产品加工人员、印染人员、宾馆餐饮业从业人员、石油天然气开采人员等
下下层	199~30	427422	63.9	44523	家禽家畜饲养人员、水产品捕捞和加工人员、大田作物生产人员(农民、渔民等)
总计		668766	100	69663	

注:在业与不在业由普查问卷的具体定义得到。在2000年11月普查时,如果问卷的被访问对象在当年10月25日至31日这一周内从事过1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或者被访对象处于在职休假、培训等状态,则视其为有工作,并定义为在业。只有这些在业人口的职业才能被记录下来。在“是否有工作”项里,长表抽样数据报告有668766人有工作。在职业项里,减去1570个不能识别的个案后,也获得了668766个个案。

资料来源: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抽样数据。

家机关负责人”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获得者的百分比”则达到了91.4%^①。从国际职业声望量表里也可以看出,同属于该大类的“人民法院负责人”的职业声望,也远远高于“工会、共青团、妇联、其他人民团体及其工作机构负责人”的职业声望。不管是国外的调查,还是国内的调查,在这一点上基本一致(许欣欣,2000)。

另外,“五普”将“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员”、“书记员”等放在同一个中类——“法律专业人员”中,而“法律专业人员”又归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大类。但无论从老百姓平常的生活感受,还是从该职业所具有的权力资源特征上来说,“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与“书记员”和“公证员”等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我们的分层指标中,“法官”和“检察官”等属于“上上层”,而“书记员”则属于“中上层”。这个问题也表现在对教师的分类上。比如,“五普”将“幼儿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等与“高等教育教师”放在同一个“中类”——“教学人员”中,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大类,但“小学教师”与“高等教育教师”的社会阶层有很大差别。不管是在收入上,还是在社会声望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另外,“五普”将“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员”、“书记员”等放在同一个中类——“法律专业人员”中,而“法律专业人员”又归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大类。但无论从老百姓平常的生活感受,还是从该职业所具有的权力资源特征上来说,“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与“书记员”和“公证员”等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在我们的分层指标中,“法官”和“检察官”等属于“上上层”,而“书记员”则属于“中上层”。这个问题也表现在对教师的分类上。比如,“五普”将“幼儿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等与“高等教育教师”放在同一个“中类”——“教学人员”中,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这个大类,但“小学教师”与“高等教育教师”的社会阶层有很大差别。不管是在收入上,还是在社会声望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① 利用“五普”长表抽样数据计算得到。

在这种情况下,要比较科学地使用普查数据,就必须在职业小类的层次上,去分析和归类人口的社会阶层。当然,这种分类法也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未曾区别同一职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可能差异。比如说同样是大田作物种植人员——农民,东部与西部地区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但因普查数据的缺陷,很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四、未来职业分层的变动趋势

以往解释人口分层及社会流动原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人禀赋与其家庭背景之上。立足于探视社会流动动因的社会学家,或者忽视了整个社会的人口学因素,或者对宏观叙事过程中的非经典原因不感兴趣。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却与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状况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从业人员的职业阶层时,就不能忽视既有的阶层结构和不同阶层的人口再生产规律。不同的阶层,在国家既有制度结构中,有着不同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虽然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时段,上层阶级会比下层阶级生育更多的子女,但考察工业化中后期人们的生育状况史就可以发现,人们生活水平和阶层位置的上移,会使其减少子女数。这个趋势,不管是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国家,都表现的十分显著^①。另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也使城市和镇的人口出生率小于农村。

然而,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带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并在城市和城镇创造了极其多的非农就业岗位。这些新创造的劳动岗位和职业类型,在城市新生人口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不得不接纳农村的新生的劳动力。这给城市新生劳动者提供了非常优越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将觅职的目光移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稳定、有保障、能够逐渐被提拔、体力支出相对较少的产业)。在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时,他们在现行制度下,甚至于宁可失业,也不愿意进入城市的“从属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新生的劳动力,就源源不断地被吸纳进了城市的底层。所以我们说,上层阶层新生人口的相对减少和下层阶层新生人口的相对增多,是导致中国新时期以来结构性社会流动的重要原因。

这种农村新生劳动力的非农化过程,在未来的城市化浪潮中,会更加波澜壮阔。因此,即使中国上层阶层对下层阶层的流入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限制,中国创造的结构性的流动机会,即由上层阶层新生劳动力的减少和下层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巨大之间的反差,仍然会为农民创造出更多的流动机会,使其子女转移进非农职业。当然,农民子女的这种流动绝大多数都属于“短距离”的流动。但这种流动会将城市新生劳动力的职业选择推向更高的层次。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伴随农民人口数量的日益减少,体力工人的人口数量会有一个长足的增长。在农民的子女将自己转化为体力工人的同时,城市新生劳动力会将他们选择职业的目光,移向半技术半体力阶层或者技术阶层。这会给城市造就出一个相当规模的中间阶层的人口群体。

只要现行生育趋势不变,那么,未来的职业流动趋势就基本如此。但即使考虑到未来生育政策的变化,在城市生育率低于农村生育率的假设条件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中国未来劳动力的职业流动,也仍然会存在城市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故由人口学因素所导致的结构性流动机会,也仍然会给农民的子女提供流向城镇的渠道。

虽然主流社会学的看法认为,在农民与“蓝领”工人之间、在“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存在着极其强烈的流动“瓶颈”限制,但这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可能起作用的“瓶颈”。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快速的非农化过程曾证明,劳动力在粮食生产与城市底层体力劳动之

^①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人口增长与随后生育率降低的经验性数据,可参见累巴科夫斯基:《苏联人口70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

间的工资收益比较,会决定此“瓶颈”限制作用的大小。而工业化过程中公共教育的投入产出,即新生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则会积极影响其在“蓝领”与“白领”之间的配置。所以,这两个“瓶颈”的限制作用,要在充分考虑到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上系统分析。

五、相关建议

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着力关注下层百姓的利益。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的 10~20 年将农民、尤其是将农民子女中的一大部分成功转化为非农阶层,那么,中国人口的职业阶层结构将大为改观。为增加农民子女转化为非农阶层的可能性,中国一方面应该通过转移支付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另一方面还应该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招生过程中,针对农民家庭的支付能力指导国立大学的招生行为,使农民出身的大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比例与这个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间的差距不致拉得太大。

将体力工人转化为非体力工人(半体力半技术工人或技术工人)的难度还很大。但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这种转化过程。正规全日制教育和非正规的技术培训,都可能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国家在进行企业立法和指导制定行业约法规则过程中,要有意识引导企业提高培训费用,使那些半技术工人能够转变为技术工人。

因为中国人口的职业阶层结构为“烛台”形,所以,在社会分层变化过程中,要防止社会的裂变。不能使社会结构更加细长,也就是说不能容忍贫富分化继续扩大。如果上层人口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益愈多,下层人口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受益愈少,那么,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另外,由于“上上层”的人们,既掌握着权力资本,也掌握着教育资本和经济资本,因此,既要着力避免上层社会的结盟,又要着力避免“上上层”人口的资本交易和资本垄断,有意识地引导社会流动,使下层社会的人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流动到“中上层”。这也是防止社会裂变的重要法则。

参考文献:

1. 许欣欣(2000):《从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看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研究》,第3期。
2. 陈婴婴(1995):《职业结构与流动》,东方出版社。
3. 戴建中(1994):《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中国社会学年鉴(199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4. 许嘉猷(1992):《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台北三民书局。
5. Blau, P.(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Free Press.
6. Goldthorpe, J.H.(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Wright, Eric Olin(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Academic Press.
8. Blau, Peter and Otis Dudley Duncan(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责任编辑:胡涛、朱犁)

告 读 者

我部尚存少量《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研究专辑》(《中国人口科学》增刊,定价9.8元)、往年杂志和合订本,欢迎订购。读者可直接向本刊编辑部订阅,订费邮局汇款、银行信汇均可。

Structure of Urban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Fractal Geometry Theory *Ban Maosheng Qi Weifeng* •39•

Based on the fractal geometry theory, this paper makes empirical study on urban system scale's fractal structure in Zhejiang province by using the data of 1990 and 2000 censuses, forecasts the scale structure of urban system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future by establishing fractal equ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Luo Jiaojiao Tu Hongbo* •44•

Based on the behavior attribution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theory and analyses some determinants that influence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through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the same law ruling both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attribution, and social achievement attribution theory provides better explanation on the social cogni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Population and Structure of Different Stratum in China *Zhang Yi Hou Huili* •53•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2000 population census and the 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 Prestige Scale,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stratum structure of employees in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armers, blue collars and white collars account for 64.0%, 23.9% and 12.2% of the total labors, respectively. Prof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managers only account for 1.1% of the total. Such stratum struc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candle-holder with a large base, which is still far from the desired.

Conditions and Determinants of County Population Outflow in Guangdong Province *Li Ruojian* •60•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2000 Population Census,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large population outflow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points out some serious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situation.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positive effects of population outflow on rural economy. Due to structural rigidity, part of the positive effects has been offset and negative effects still exist.

Debates on 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and Necessity for Adopting It *Wan Chuan Wang Dezhu Li Bo* •66•

There are three waves of debate on the necessity of 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in recent years. Some advocate to abolish it because of its conflicting with the Law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e and the citizen right of free migration. They argue that this restriction leads to the rural-urban divide, forms stratum discrimination, and prevents temporary population from being treated as citizenship with equal right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ose points of view obscu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system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ree migration and free residence registration, giving the wrong explanation of the rural-urban divide, because they fail to give proper evalu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formed Choice's Impact on and Contribution to Family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Public Policies *Zhou Weiwen et al.* •72•

Informed choic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residents' rights to know the consequence of contraceptive methods and to decide for themselves. It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role from administration to service. It introduces the human concerns and modern management concept into family planning, significantly reshaping the practice of family planning and providing valuable lessons for the ongoing reform of public policy and governance in China.